

论贺麟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龙佳解 周晋

(湖南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0; 湖南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哲学反思的基础上, 贺麟提出了“精神性的自然”观念, 主张实现自然的精神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统一, 以“回归自然”为宗旨,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关键词: 自然观; 自然的精神化; 回归自然;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生态危机是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且矛盾愈发尖锐的一个全球性事件。长久以来, 对克服乃至彻底解决这一矛盾及其弊端的呐喊和思考不曾中断。20 世纪中叶, 以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森为代表的学者、政治家以及众多民间人士积极投身生态运动, 拉开了“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的大幕, 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团体或组织跨入环境保护事业的队列, 半个多世纪以来, 被一种唤醒的生态意识所审视的工业社会的文明成就被打上了“增长着的生产力与增长着的破坏性的统一”^[1]的不光彩标签。在今天这样一个依托技术媒介作用的技术化生存时代, “技术合理性”正瓦解或成为政治合理性内在的核心要素, 人类中心主义霸权对解除了神性和诗性光辉的自然上演着掠夺式洗劫, 而高度制度化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又在进一步扩大着人类对自然的控制, 那种被安排在一种稳定的“社会防卫结构”中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财富的人类生存模式也因此得到了技术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辩护。而在另一个极端上, 人类又无时无刻不在接收到来自人类生存家园——自然所发出的“危机信号”。这样一种对立现状赤裸地呈现了人与自然激烈的对抗性关系, 同时隐含其中的还有人类对当前和未来的普遍性忧虑。早在建国之前, 贺麟就对如何建立健全合理的人生观, 培养“新民”以适应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作了前瞻性思考, 其理论精华主要凝结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之中。在今天这个呼唤“绿水青山”的时代, 有效吸取贺麟先生自然生态思想的理论资源, 对借以系统反思工具理性所引发的破坏性增长, 破解人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困境, 构建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绿色发展理念具有积极意义。

一、自然是人的双重对象

在贺麟的哲学探索中, 自然这一对象是反思人生观、价值观不可跨越的思维起点。贺麟的自然观本质上是其“新心学”原理在自然这一研究对象上的具体展开。从唯心论哲学立场出发, 贺麟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 心为体, 物为用, 提出“心是主宰部分, 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 物为心之用, 心为物的本质, 物为心的表现。所谓物者非他, 即此心之用具, 精神之表现也。”^[2]这种观点实质上又与陆王“心学”相呼应。如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写到:“夫物理不外乎吾心, 外吾心而求物理, 无物理矣”, 此即与贺麟心物相即不离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 贺麟受欧洲近代唯心思想影响颇深, 其观点对德国古典哲学有所借鉴。在自然观上, 尤以谢林的自然哲学对贺麟的影响较突出。在谢林的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中, 前者从自然追溯到精神, 后者从精神引出自然, 以此来解决自然和精神的同一性问题。据此, 贺麟提出自然是人的精神的反映, 是人的精神的外在符号和象征。贺麟从谢林主客同一的思想观点出发, 会通儒学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 形成了一种诗化的、审美化的自然观。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 人生以自然为对象, 离开自然也就意味人将丧失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基本场域, 也就意味着, 人将丧失获得人的本质的基础, 割裂人的完整性。因此“回归自然”也就被赋予了返本求真的重要意义。“要想真正了解人生, 必须‘深入无人之境’。所谓‘无人之境’, 是很可以耐人寻味的境界, 其含义之一, 应是自然。”^[3]有必要强调的是, 这里所讲的对象“不仅仅指人出于功利目的的, 从中索取生活必需品, 更重要的是指人与自

然在哲学、美学、意义、价值等精神层次上的依赖关系”。^[4]因此，贺麟将功利主义自然观视为一种低层次的、有待发展的自然观念，它代表的是一种工程技术思维。

此外，贺麟对自然内涵的理解是有所区分的。在贺麟看来，自然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结果的文化自然和作为精神外化结果的自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代表自然的征服，是科学上的概念，既包括科学研究的物理自然事物，又涵盖了物质文明。人们谈论自然，往往倾向于此种含义，大谈物质文明或社会经济方面。后者则是指“具体的，有机的，美化的，神圣的外界。这个意义的自然，可以发人兴会，欣人耳目，启人心智，慰人灵魂，是与人类精神相通的。这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自然。”^[5]这种理解亦即前边提及到的诗化的、审美化的自然。剔去贺麟对自然理解的唯心论的色彩，这也就是说，自然除了科学意义和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还包含诗意的、有生命力的、有灵魂的，能陶冶情操、能赋予人生以力量的内涵。从自然与人的联系的来看，后者可以视为前者基础上的再创造，是标秉人力的非纯粹自然。由于对精神性的自然的重视，贺麟十分拒斥机械主义自然观的那种僵死的物质观，它将自然视为缺乏启发人的生命情感和力量的精神活力的僵死的物质。

在功能上，贺麟认为，自然是人生力量的源泉。一方面，人生需要自然来培育，供给能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自然提供给人生的“净化教育”。人生来要接受社会化的竞争和规训以求适应生存，人的不自由状态导致诸多“灵魂的疾病”。而自然的“净化教育”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类从普遍的主体性困境中解放出来，促进人性的自然发展。如贺麟自己所言，他对儒家进取的自然观十分欣赏。区别于一种道家清静虚无的消极自然观，儒家的自然观于自然中可见人力，于自然中可见人生之真理，既是审美的，又是道德的。自然承担的一个重要角色即扮演一个物质文明之外可供参照的镜鉴，这个镜鉴的意义就在于人可以从人类生存异化状态中暂时抽身，获得一种超越性的反思视野，审视当前人类世界中非生态的、对抗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存模式。

二、儒者是自然的真正主体

自然与人生不同的地方在于，自然是无我的，没有意志的，而人是有我的，具有意志、情感以及思想。因此，在贺麟看来，离开人去谈自然，自然将是虚妄不实的，无法被真正认识。从逻辑上讲，不被主体的意志所经验和观念化统摄的自然是不可能被认识的。故而，从主体的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是揭示人与自然关系实质的关键所在。

从人类的主体视角来看，自然是人得以自我实现的材料、工具和手段。在这里，人的自我实现与自然自身的升华应该是同一的。从物质自然的角度来看，贺麟认为对自然的认识及人类物质文明的建设，其基础就在于“背后的主人公的意志的支配”。人的意识活动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激发的直接原因。贺麟曾提出一切经济都是“计划经济”的观点。在他看来，“计划经济”之所以是一种对人类活动普遍性特征的描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唯有有理智的、有善恶观念的人方能使之来，使之去，使之活动，使之发展。简言之，经济是人造的。经济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力征服自然的收获。”^[6]显然，贺麟是在强调自然本身缺乏一种自我建设的自觉能动性，纯粹的自然表现为自在的重复。因此，贺麟认为不出于人的自觉意识的道德的努力，并无以创造近代灿烂的物质文明。其次，物质财富的真正价值不能仅仅从货币或经济效益的层面进行估量，而应该内在包含合法的道德动机和道德目的的规定性，克服其单一维度或片面的评价标准。在贺麟看来，自我是在解除自然与人生的对立关系中获得发展的，个人正是在自我活动中不断将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推向更高的精神境界。

在中国，贺麟较早提出了文化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的先进理念，反对经济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的道德观点。健全的物质建设必以心理建设为深厚的精神基础，故此，贺麟对那种“生产方式和物质条件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思想道德的现代化”的观点不以为然。与此同时，他要求辩证把握经济基础与思想道德建设的互动作用，反对空谈道德哲学的思辨逻辑，无视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基本前提。而为了真正建构一条物质生产与思想道德文明建构有机结合的现实路径，推进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展开，贺麟将思维视点转向了儒家哲学传统，以“人的实践”

为耦合点,试图开掘儒家人格在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互动模式中的新境界。就理论层面而言,儒家的人文主义内涵以及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精神境界的“天人合一”理念已被广泛运用于现实生态问题的分析,但这些分析讨论往往着眼于观念层面的辨析及批判,而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忽视了“最革命、最积极”的要素——现实的个人。一切问题以人开始,也因人结束。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问题,人始终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一主体意识刺激之下,贺麟突出强调了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核心地位及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出建构和培育新儒者人格的道德理想,以期应对工具理性主导之下的破坏式发展困境。

那么,新儒者人格是什么呢?贺麟指出:“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我们说,在工业化的社会中,须有多数的儒商、儒工以作柱石,就是希望今后新社会中的工人、商人,皆成为品学兼优之士。……但因限于资质,无才能知识而卓有品德的人亦可谓为儒者。……惟有有学无品,有才无品,只有知识技能而无道德,甚或假借其知识技能以作恶者,方不得称为儒者,且为儒家所深恶痛绝之人”。^[7]即表明,新儒者是以儒家道德为本位的,追求自我之本性的健全实现,是以用价值理性补缺工具理性,借工具理性彰显价值理性,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统一观念自觉和实践自觉。

此外,贺麟主张吸收资本主义精神之源的新教伦理,以此克服儒家的道德至上主义传统,“将西方现代社会行之有效的职业精神与儒家的道德价值相结合,使职业人生儒家化、道德化,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新的儒者”,^[8]以期推动人们转变自身的狭隘发展观念,完成主体内在的“生态化”革命,建立健全合理的人生观。

三、人与自然合一于自然

从混濛一体到对立征服,再到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关系及人们对这一关系的认识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而愈益丰富和完备。而在贺麟看来,“回归自然”,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状态。

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基于自身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观察出发,贺麟也概括总结了四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典型性观点。第一种,自然是人生的工具或材料。强调自然的有用性,即“自然对人生是有益的,是可以供人生享用的。”^[9]该自然观念可满足寻求科学的真理和物质的实用。第二种,自然是人生的反映。“自然是人生一切的表现,是人类精神的象征。自然是人类内心宝藏之外在的记号”。^[10]这种看法,实质上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行关系,即两者互相映衬,可给人以生活的美感和精神的寄托。第三种,自然是人生的本源。人是自然整体之一部分,自然与人本性相通,人受自然支配。因此,自然从根本上就被看作是人的最终归宿,人当忘我于自然,相融于自然,追求与自然合而为一。在这种意义上,贺麟主张的“回到自然”实则是回复本性,使“自然与人生打成一片,休戚相关,哀乐与共,自己的人格,浸透在自然里,自然的美德,也呼吸在自己的人格里。”^[11]第四种看法,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以人为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则就逻辑的意义来说,离开人生,自然就没有主体,离开自然,人生就没有对象。”^[12]在贺麟看来,人与自然这一主客关系并不是静止的,而是辩证发展的,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客混合难辨。第二阶段,主客之间彼此分离,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彼此隔膜对立。“自然与人生,互争主奴,自然是人生的敌对,不是人生征服自然,就是自然征服人生”。^[13]第三阶段,主客合一于精神。在这一阶段中,自然成为精神化的自然,人生成为精神化的人生。自然建筑在人生上,人生包蕴在自然里。^[14]贺麟强调在主客统一里主张思维的统摄和主宰作用。在此,“主客合一”即指自然的内在化、精神化、人文化,在主体的精神视域内赋予自然以道德和审美层面的意蕴,真正实现“物融于我”的“天人合一”境界。

据此上述可知,贺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上,一方面肯定人的主体性价值和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自然对于人之生命的本源意义。如贺麟所言:“回复自然,即所以充实人生;仰慕追求无限的自然,并非埋没自我,丧失主体,正所以发展自我,提高主体。”^[15]这是一种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各自片面性的自然观,主张哲学、宗教、艺术、

道德紧密结合，从真、善、美三者统一的视角去认知自然与人的关系。贺麟正是试图借助这一复合视角来重新认知和赋予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内涵，即人的自我本质的实现恰恰表现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

四、贺麟人与自然哲学思考之评析

正如贺麟先生自己所言，在全部哲学思索的背后“有我的时代，我的问题，我的精神需要”。贺麟的人生哲学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是在怀抱着复兴中华民族之历史使命的信念刺激下开始的，浸透着一位思想家的智慧和真挚情感。客观来说，贺麟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索所立足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但哲人留下的思想财富仍有待我们认真开掘，推陈出新。一方面，贺麟先生强调自然的精神性，要求我们将物质自然与纯粹自然区别开来，并从美学和道德层面沟通自然与人的精神，并将自然呈现为人生的本源之所。这种理解要求我们从主体的立场恢复自然的德性，恢复自然在人类物质文明建设中被消解的价值属性，调解被不合理的物质生产方式所激发出来的人的畸形欲望或需求与合理的多元化生活需要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如法国生态思想家莫斯科维奇在《还自然之魅》中指出：“现代文明诞生于机械学与机械精神的结合”，^[16]其结果是去除了自然世界的神圣光辉，因而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自然应有的敬畏和尊重。生态运动的努力方向即“还自然之魅”。另一方面，贺麟表达了一种乐观的生态进化观，即认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不是绝对的、永恒的，是人类可以通过发挥自我的主体能动性去克服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将走向和谐共生模式。但需要加以批判的一点是，贺麟逻辑地论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精神化道路，却最终无法使其真正转化为一个具体实践过程。纵观贺麟先生的思想历程，早期偏重采用一条思辨的路径把握人与自然矛盾关系，悬设了“道德主体”的抽象形象，过分突出人的主体性作用，后期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开始自觉扬弃黑格尔式的空洞思辨，亦即“颠倒的世界意识”，从哲学理想的抽象性和空洞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关系的精神辩证法只能起到意识引领的作用，最终必须具体地运用到人类的实践中去。

站在一种唯物史观的反思立场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追求自由而全面解放的一个基本维度，而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同样是客观的。从外在自然方面来看，表现为人类劳动实践与自然的冲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类的生产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改变人对自然的理解及其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及专业分工的不断发展，变得愈发尖锐。事实上，在自然形成而非出于自愿的社会分工当中，构筑起个体生存体验的劳动实践及与之相关联的种种的交往形式则被局限于特殊的活动范围，因而导致狭隘的、不健全的精神生产及再生产过程。其次是人的内在自然方面，表现为人的生理欲望的需求与满足之间的冲突。在当下阶段，一种为消费文明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推崇的庸俗快乐主义和拜物教心理正将我们的生命体验更加迅猛地推向欲望的深渊，即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裂缝不是缩小了，而是剧烈放大中。总体来看，对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模式的期待实质上人对自然界及自身状况认识程度的反映，而这种认识程度归根结底又必须放到特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去理解。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解决可本质上是个体对自身不成熟状态的不断克服，而这种不成熟状态就包含了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不成熟认知。因此，真正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关系问题的真正钥匙也必须从当前人类生产方式及所形成的现实关系中去寻找。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统治时代，技术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生存框架。一方面，技术统治及工具理性使人类在效率至上和个人利己主义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另一方面，技术本身也包含着一种拯救的力量，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必须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重新置于合理的平衡控制之下，利用包含生态关怀的技术创新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发展，使人们从控制自然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改变过去那种单向度的、非生态的发展方式，构建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健康发展。就像海德格尔所言：“人在其存在的历史的本质中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者，这个存在者的存在作为生存的情况是：这个存在居住在存在的近处。人是存在的邻居。”^[17]我们不是自然的主人，我们是生生世世栖居其上的家园建设者。

参考文献

-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4.
- [2]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91-292.
- [3]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5.
- [4]张学智.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252.
- [5]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5-116.
- [6]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8.
- [7]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12.
- [8]徐建勇.论贺麟的新儒者人格[J].孔子研究.2011(05):61.
- [9]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7.
- [10]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8.
- [11]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9.
- [1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2.
- [13][14]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2.
- [15][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5:91.
- [16][德]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70.

On He Lin'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Long Jiajie Zhou Ji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 Nan Province, 410000;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 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 Based o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Mr. He Lin putted forward the concept of natural spirit, advocated the unity of natural spirit and human nature, and ultimately proposed "returning to nature" for the purpose of harmonious 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words: Mr.He Lin; concept of nature; the unity of natural spirit; returning to nature